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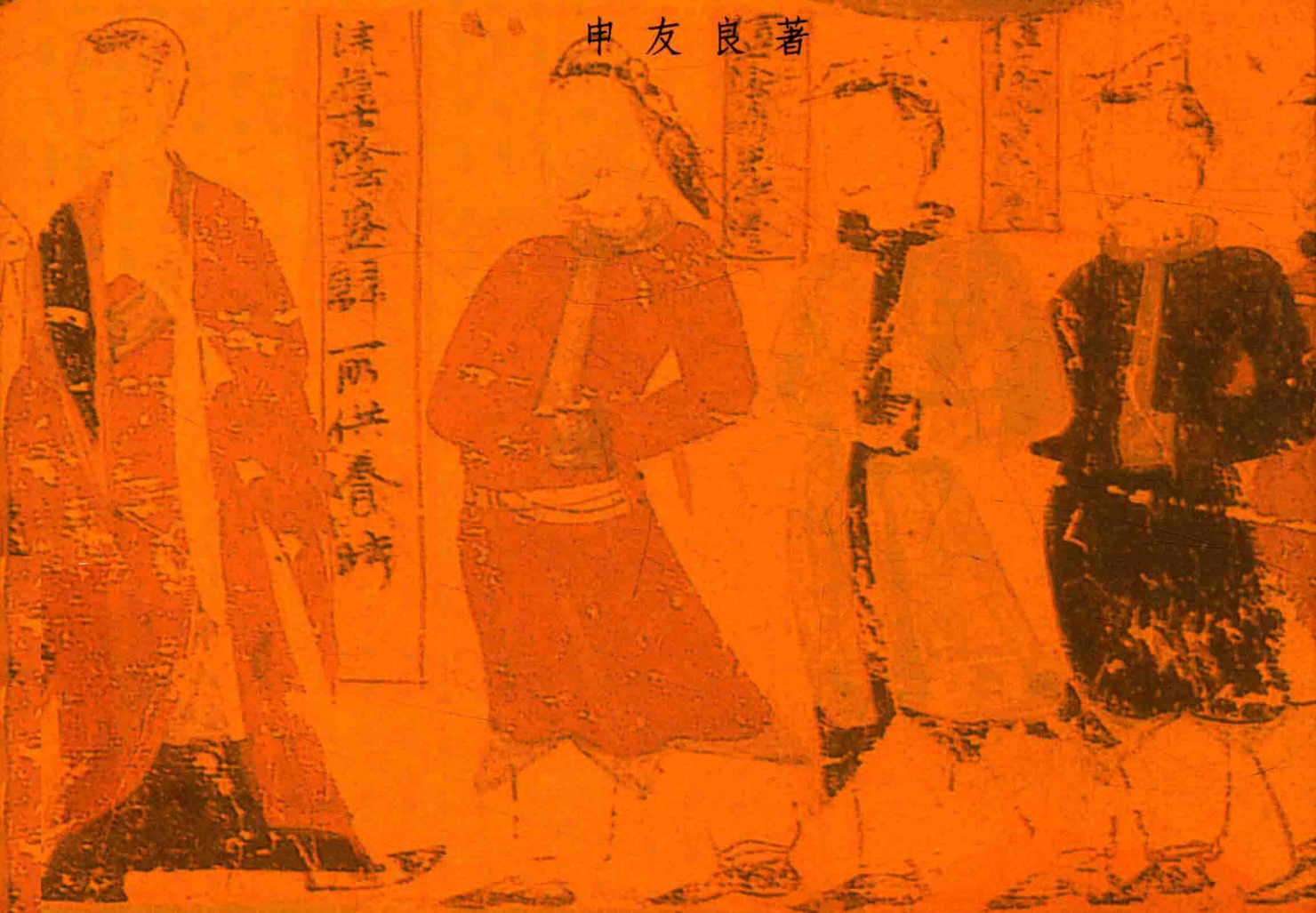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第十六冊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申友良著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王明蓀主編

第16冊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申友良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申友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2+222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16 冊）

ISBN 978-986-404-613-3（精裝）

1. 商業經濟 2. 元史

618

105002222

ISBN-978-986-404-613-3



9 789864 04613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404-613-3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作 者 申友良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70047 字

定 價 十五編 23 冊（精裝）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申友良 著

作者簡介

申友良（公元 1964 年農曆 6 月 28 日～），字泰鴻，男，籍貫湖南省邵東縣。歷史學博士、博士後，歷史學教授，現供職於嶺南師範學院歷史系。主要研究專長為中國古代史、中國民族史、中西文化交流、廣東地方史等方面，特別是在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國古代遼金元時期歷史研究以及馬可波羅研究等方面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先後出版專著《中國北族王朝初探》、《中國北方民族及其政權研究》、《馬可波羅時代》、《報王黃世仲》、《馬可波羅遊記的困惑》、《馬可波羅與元初社會》、《史學論文寫作指南》等 7 部，參編《文物鑒定指南》、《新中國的民族關係概論》、《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等，發表學術論文 60 多篇。

提 要

《馬可波羅遊記》是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比較真實地記錄和反映了元初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情況，為研究元初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範例。本書從兩個方面來進行研究：一是對元初的重商主義傳統的分析，因為蒙元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唯一重商的朝代，從成吉思汗開始，歷代的統治者都一直遵從這種重商的傳統。因此，元朝的社會風俗等諸多方面都深受影響。本書側重於對元代商業發展的宏觀環境研究，比如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元代統治者們對於商業的重視，還有元代商業環境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以及元初商業經濟發展狀況等。二是對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的分析。作為商人子弟的馬可波羅，出於對商業的敏感，記載了大量有關元初商業經濟的材料，這為研究元初的社會經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本書側重於《馬可波羅遊記》裏所反映出來的元初商業經濟的狀況研究，比如元初的商業城市商業經濟、商人的經濟思想和道德等。

本書為 2013 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共建項目」
「從馬可波羅遊記看元初商業經濟」
(GD13XLS03) 的最終成果

本書由嶺南師範學院南海絲綢之路創新中心資助



目

次

上編：元代的重商主義傳統

第一章	成吉思汗時期的「重商主義」研究	3
第二章	窩闊台時期的「重商主義」研究	13
第三章	忽必烈時期的「重商主義」研究	25
第四章	忽必烈喜用斂財之臣研究	39
第五章	元順帝時期的「重商主義」研究	47
第六章	元代重商傳統下民商的興起研究	59
第七章	元代的重商主義與社會風氣研究	71
第八章	元初的幹脫商人與商業經濟研究	79
第九章	元初「重商傳統」對統治階層的影響 研究	87
第十章	元代「重商傳統」對農民階層的影響 研究	95
第十一章	元代「重商傳統」對士人階層的影響 研究	105
第十二章	元代「重商傳統」對商人階層的影響	117
第十三章	元初商業經濟的發展狀況	127

下編：馬可波羅與元初商業經濟

第十四章	《馬可波羅遊記》裏的元初商業繁榮	139
第十五章	《馬可波羅遊記》裏的商人及其經濟思想	153
第十六章	從《馬可波羅遊記》看元代商業及其道德	163
第十七章	《馬可波羅遊記》與元初揚州的商業經濟	175
第十八章	《馬可波羅遊記》與元初泉州的商業經濟	185
第十九章	《馬可波羅遊記》與元初杭州的商業經濟	195
第二十章	《馬可波羅遊記》與元初北京（大都）的商業經濟	205
第二十一章	《馬可波羅遊記》與元初上都的商業經濟	215

上編：元代的重商主義傳統

第一章 成吉思汗時期的「重商主義」研究

「歷史上最偉大的，也常常是最有利可圖的事業，不是創建一家企業，而是建立一個帝國。」蒙古帝國的創建者——成吉思汗，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他所取得的成就舉世公認。那為什麼成吉思汗能夠打敗那麼多的對手而建立起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呢？原因就是他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的支持。而蒙古帝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又來源於成吉思汗的重商主義思想以及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本文將從成吉思汗重商的原因、發展經濟的措施、成吉思汗時期經濟社會的繁榮狀況以及「重商政策」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以研究成吉思汗的「重商主義」思想。

一、成吉思汗重商主義思想的根源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成吉思汗重視商業的原因：從思想基礎上來說，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來自於畜牧業生產方式本身。游牧業生產的單一性與人們需求的多樣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這種經濟形態的半自給性和依賴性。因此，交換便成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業精神變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徵，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正好與城市發展及其條件相反，對那些沒有定居的游牧民族來說，商業精神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卻往往是他們固有的特徵。」^{〔1〕³⁷¹} 身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是天生的重商主義者，因為他們所居之處，往往不利於農耕，資源也相對缺乏。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描述蒙古各部族生活情況時說：「他們當中富有的標誌是：他的馬鐙是鐵製的；從

而人們可以想像他們的其它奢侈品是什麼樣了。」^{[2] 23} 所以，要想得到糧食、食鹽和工具，就必須發展貿易。而且早在成吉思汗未統一蒙古時就有關於蒙古部落與回回商人之間進行貿易的記載——「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爾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3] 9}。由此可見，蒙古部族發展經濟貿易既有歷史傳統的影響又有現實生活的需要。

第二，從成吉思汗自身來分析，他是一位偉大的帝王，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的龐大帝國。誠然，建立這樣的一個帝國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但軍隊的強大需要厚實的經濟基礎作支撐。而且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之後，蒙古社會對工商品及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連年征戰各種戰略物資的補給越來越重要。而當時蒙古社會以游牧經濟為主，完全滿足不了蒙古社會及戰爭補給的需要。所以，成吉思汗要完成其征服世界的偉業以及滿足帝國民眾的生活需要就必須發展經濟貿易。

二、成吉思汗「重商主義」的相關政策

（一）尋求與鄰國開展正常的貿易活動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征服西夏后，便與中亞帝國花刺子模成為鄰國。《風暴帝國》中記述：「1215年，成吉思汗在接見花刺子模使者時說，他承認花刺子模國王摩柯末是西方的統治者，而自己是東方的統治者。在他們之間應當訂立一個和平友好的協議，允許雙方的商人自由通商。」成吉思汗在給摩柯末國王的國書中寫道：「我只是希望我們的臣民之間，可以相互交易，為雙方的利益著想。」^{[4] 247}「當他們回去時，成吉思汗吩咐后妃、宗王們和每個異密各派兩三名親信帶著金銀巴里失跟隨他們前去，到花刺子模國內去進行貿易，換取當地的珍品，后妃、諸王、異密們奉命從自己的下屬中指派一二，集合起了四百五十個伊斯蘭教徒」^{[5] 258~259}他們代表蒙古汗國與花刺子模國進行貿易，可見成吉思汗對商業的重視。但花刺子模人殺人奪財，使蒙古人失去了在戰爭中得之不易的財富，而且阻塞了東西方的貿易，引起成吉思汗的極大憤怒，第一次西征隨之爆發。

（二）重用商人，或任命商人擔任政府要職，以促進商業發展

成吉思汗身邊早早就聚集了一批商人，如前文提到的回回商人阿三，後

來又有一個田姓回鶻人，「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深悉內地的富庶情況，乃唆使成吉思汗南侵。「1215年，花刺子模派使臣來到蒙古汗國，成吉思汗也派了使者和商隊報聘，使團的首領一是花刺子模人馬哈木，一是訛答剌人玉素甫·坎哈，一是不花剌人阿里火者。可見成吉思汗身邊很早就聚集不少西域商人。西域商人或在蒙古政權中工作，或來東方經商。蒙古貴族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剝削定居人民，西域商人憑著『能知城子的體例、道理之故』，充當了他們搜刮財富的幫手，在蒙古國的經濟事務中擔任了重要角色。」^{[6] 226} 回鶻富商鎮海就是成吉思汗的四大名相之一，回回人阿三、阿合馬、桑哥及漢人盧世榮均為商人，他們都先後為成吉思汗主掌財政經濟大權。

（三）支持各類商業活動，嚴厲打擊盜匪，保護商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成吉思汗曾經頒佈了這樣一條紮撒：「凡進入他的國土內的商人，應一律發給憑照，而值得汗受納的貨物，應連同物主一起遣送給汗。」^{[2] 125} 這條紮撒表明，商人在成吉思汗統治的區域內是受到政府的保護的，而其中較大商業活動甚至可以與大汗作交易，這無疑是對商人極大鼓勵與吸引，所以大量回回商人輾轉於西亞、中亞與蒙古汗國之間，在蒙古汗國統治者的鼓勵下追逐商業利潤，「哪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裏進發。」然而，商人們長途跋涉的商業活動經常會遇到攔路虎——盜匪；蒙古部落原本生活在蒙古草原，是典型的內陸經濟，商業貿易以陸路為主，而且他們視搶劫為豪勇與高尚之舉，搶劫成風，這種情況極大的阻礙了商業貿易的發展。這種情況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為了保證商人們能夠順利地進行貿易交換，他嚴厲打擊貿易線路上的盜匪，並對搶劫盜竊者進行嚴厲的處罰。據《黑韃事略》記載：「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知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7] 69} 犯搶劫、盜竊罪者，不僅處以極刑，沒收其家屬、財產，而且主奴「連坐」，足見其防範之嚴、處罰之重。經過成吉思汗的打擊整治之後，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於在從中國到裏海的範圍內強行貫徹鐵的紀律，成吉思汗平息了無休止的內戰，為商旅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齊寫道：『在成吉思汗統治下，從伊朗到圖蘭（突厥人的地區）之間的一切地區內是如此平靜，以致一個頭頂大金盤的人從日出走到日落處都不會受到任何人的一小點暴力』。」^{[8] 322}

（四）修築道路，以促進商業貿易交通；設置驛站，予往來商旅之便利

對於內陸經濟來說，四通八達安全通順的商業貿易交通網絡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成吉思汗十分重視蒙古汗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諸國陸路交通道路的建設和維護。史料記載：「有一天成吉思汗坐在阿勒臺山上，掃視了〔自己的〕帳殿、僕役和周圍的人們，說道：『我的箭筒士（豁兒赤）衛隊多得像密林般地烏黑一片，我的妻妾、兒媳和女兒們像火一樣地閃耀著、發紅，……我要賜給他們多草的牧場放牧牲畜，下令從大路上和作為公路的大道上清除枯枝、垃圾和一切有害的東西，不得長起荊棘和有枯樹。』」之後，他又在給花刺子模國王的外交國書中說道：「爲了在兩國溝通協作一致的道路，要求〔我們拿出〕高尚明達〔的態度來〕，擔負起患難相助的義務，將〔兩國之間的〕道路安全地維護好，避免發生險情，以使因頻繁的貿易往來而關係到世界福利的商人們得以安然通過。」^{[5] 127} 成吉思汗曾經命令：「爲盡快得知國內發生的事變，必須設立常設的驛站。」驛站的設置不僅是爲了保證政治通信的暢通，也爲商業貿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正如《世界征服者史》所描述的：「他們的領土日廣，重要事件時有發生，因此瞭解敵人的活動變得重要起來，而且把貨物從西方運到東方，或從遠東運到西方，也是必須的。爲此，他們在國土上遍設驛站，給每所驛站的費用和供應作好安排，配給驛站一定數量的人和獸，以及食物、飲料等必需品。」^{[2] 34} 驛站的設立不僅保障了道路交通的方便，而且爲客商的生活必須品的獲得提供了方便。

三、成吉思汗統治下蒙古汗國社會經濟的繁榮狀況

在上述成吉思汗的一系列發展商業貿易的政策指導下，蒙古汗國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股商業貿易的浪潮。不管是社會上層的統治者抑或是底層的老百姓，都積極參與到商業貿易活動中去，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的材料來分析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狀況：

（一）商人得到重視以及地位的提高

在古代中國，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都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社會的人民分爲四類，即「士農工商」，其中治國人才「士」排在第一位，而負責互通有無的「商」排在最後一位，商人的社會地位普遍較低。而在成吉思汗時代則不一樣，他認為商人不是世人鄙視的對象，而應該是人們學習的楷模。他

在《必里克》中說：「就像我們的商人帶來織金衣服和好東西並堅信能從這些布匹織物獲得巴里失那樣，軍隊的將官們應當很好地鼓勵兒子們射箭、騎馬、一對一格鬥，並讓他們練習這些事，通過這樣的訓練把他們練得勇敢無畏，使他們像堅毅的商人那樣掌握他們所知道的本領。」^{[9] 357} 他鼓勵子孫後代學習商人們不怕困難，兢兢業業，敢冒風險，勤奮好學的創業精神。在成吉思汗時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前文也說到蒙古政權中有不少商人擔任要職並對蒙古汗國的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可以說商人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是如魚得水，「商人、投機者、尋求一官半職的人，來自世界各地，都達到他們的目標後歸去，他們的願望和要求都得到了滿足，而且所得倍於所求。多少窮人富裕起來，多少貧民發財變富，每個微不足道的人都變成顯要人物」，越來越多的人都積極參加到商業貿易中去，那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二）商業貿易活動成為上至統治階級下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成吉思汗重商不僅僅是在思想上，他本人還積極參與到商業貿易活動中，起到帶頭示範的作用，元代經濟專家李幹說：「皇帝是最大的商人，其經商手段主要是付回回以銀、令其經商納利。」^{[2] 300} 而《黑韃事略》也有類似的記載，「當時蒙古人在向中原和西方世界征服時『雇傭了更為開化的克烈人和畏吾兒突厥人（即中亞地區穆斯林）』為蒙古貴族從事貿易活動。成吉思汗率蒙古軍佔領黃河以北地區後，蒙古人與當地商民進行貿易，以『黍料，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麥八十斤。蓋麥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10] 123} 貴族、官吏、寺院住持等經商成為普遍現象。一般百姓，甚至軍人都開始參與買賣活動。《馬可波羅遊記》中有「家庭裏面凡有什麼買進賣出的商業（生意）由婦女經營」，軍人經常帶一些土特產隨時準備交換。人們進城售其牲畜及乳類品，購置所需物品等記載^{[11] 62}。可見，從 13 世紀開始，從蒙古皇帝帶一般百姓已經普遍參與經商活動。商業貿易成為他們一種必要的謀生及致富手段。

（三）商業發展促進城市興起，城市內部形成專賣市場

蒙古腹地城市的興起，社會有了較細的分工。「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城」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為商業

的概念，即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最早的「城市」（實際應為我們現在「城鎮」）就是因商品交換集聚人群后而形成的。而城市的出現，也同商業的變革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最初城市中的工業集聚，也是為了使商品交換變得更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銷售）而形成的。由於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們重視發展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和交通運輸業，蒙古腹地相繼出現早期城市，哈刺和林便是其中之一。《多桑蒙古史》中有關於當時哈刺和林城內貿易區域劃分的記載，「城內有兩條大街，一名回回街，市集所在，……外國商賈及各地人民皆輳於此焉；一名漢人街，工匠所居。……東門售粟及其它本地出產不豐之穀物，西門售羊及山羊，北門售馬，南門售牛及車。^{[12] 203}」可見當時蒙古地區的商業貿易及專賣市場已具雛形。

（四）商業貿易使蒙古人生活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裏有這樣的一段描述：「西方原來的貨物統統交給他們，在遙遠的東方包紮起來的物品一律在他們家中拆卸；在他們居住的市場上，寶石和織品如此之賤，以致把它們送回原產地或產礦，它們反倒能以兩倍以上的價格出售；……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威風凜凜的庇護下，蒙古人的境遇已從赤貧如洗變成豐衣足食。至於別的部落，他們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們的命運也牢牢確定。凡是從前購置不起一張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們做三、五萬金巴里失或銀巴里失的生意。^{(2) 24}」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東西方往來貿易十分頻繁，各種貨物在市場上有售且價格便宜，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貧窮變得富有，由買不起一張棉絮床到可以做三、五萬金巴里失或銀巴里失的大生意。這一切都能讓我們感受到當時蒙古社會的社會經濟是何等的繁榮。

四、「重商主義」政策帶來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

（一）成吉思汗時期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對蒙古汗國以及中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1、首先，它促進了蒙古社會生活一度的繁榮

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蒙古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百業俱興，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志費尼作過比較詳細的描述：「成吉思汗出現前，他們沒有首領或君主。每一部落或兩部分散生活；彼此沒有聯合起來，其中時時發生戰

鬥和衝突。他們有些人把搶劫、暴行、淫威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爲。契丹汗經常向他們強徵硬索財物。他們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這些動物的肉和其它死去的東西。他們當中富有的標誌是：他的馬鐙是鐵製的；從而人們可以想像他們的其它奢侈品是什麼樣了。他們過著貧窮、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舉，他們才從艱苦轉爲富強，從地獄入天堂，從不毛的沙漠進入歡樂的宮殿，變長期的苦惱爲恬靜的愉快。他們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彼等喜愛之山珍海味，彼等造擇之果品……西方原來的貨物統統交給他們，在遙遠的東方包紮起來的物品一律在他們家中拆卸；在他們居住的市場上，寶石和織品如此之賤，以致把它們送回原產地或產礦，它們反倒能以兩倍以上的價格出售；……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威風凜凜的庇護下，蒙古人的境遇已從赤貧如洗變成豐衣足食。至於別的部落，他們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們的命運也牢牢確定。凡是從前購置不起一張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們做三、五萬金巴里失或銀巴里失的生意。^{[2] 24}」

2、其次，成吉思汗在實現吸收世界先進經濟成果的過程中，促進了東西方民族間經濟的交流和合作

法國學者萊麥撒說：「蒙古人西征，將以前團塞之路途，完全洞開，將各民族聚集一處，……中世紀漫天黑雲，使人不得望見天日，至是乃因蒙古遠征，而重現光明。當時戰爭殺人，盈野盈城，似爲人類慘禍，而不知實如空天霹靂，將幾百年之酣睡懶病，自夢中警醒」。^{[13] 147} 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蒙古帝國將中原黃河流域的經濟中心，中亞河中、呼羅珊地區的波斯和伊斯蘭經濟中心和蒙古高原游牧經濟中心通過日益完備的驛站連接起來，促進了東西方民族經濟的交流。正如 B·B 巴托爾德所說：「蒙古帝國把遠東和近東的文明國家置於一個民族、一個王朝的統治下，這就不能不促進貿易和文化珍品的交流，中亞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得到了空前繼後的發展」。^{[14] 190} 到成吉思汗的晚年和窩闊台繼位初期，隨著統一的擴大和屠殺，搶劫的減少及賦稅的減輕，以前被破壞的地區的經濟逐漸復蘇，如撒麻耳干在牙老瓦赤掌管下，「人們從世界各地到那裏去，因他的誠摯，該城日趨繁榮，甚至達到它的頂峰，其領域成爲名門望族的家園，貴人黎庶的聚集地」。還有一些地區至少在蒙哥統治時期在某些方面「達到原來繁榮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難接近原來的水平」。隨著經濟的恢復發展，「穿過中亞的陸上貿易在蒙古人統治下復興」。東西方民族經濟得到合作和交流。